

# 辛亥前後革命派宣傳活動 與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

章揚定 陳慶勝

---

**[提要]** 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是時代思潮與其自身思想變遷相結合的產物。輿論宣傳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報紙、雜誌、書籍、演說是傳播革命思想的有效工具和途徑，對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華僑的民族民主意識覺醒儘管有各種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但孫中山革命派的海外組織宣傳活動無疑把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孫中山革命理論的完善、民族民主革命事業的蓬勃發展與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也有著密切關係。覺醒了的華僑是孫中山開展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民主革命進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關鍵詞]** 辛亥革命 華僑 民族民主意識

**[中圖分類號]**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1 - 0183 - 08

---

任何事物和思想的發展都有其淵源，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也有歷史淵源可尋。“海水所到之處有華僑”，華僑作為“革命之母”為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導因於時代激蕩的潮流，成長於自身的思想變遷，但孫中山革命派的海外組織宣傳活動促進了它的覺醒，並使它達到時代的高點。

## 一、華僑民族民主意識覺醒的因素分析

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旅居海外以南洋、美洲為最，旅居日本者雖不多，但頗具代表性。

南洋毗鄰中國南部，同中國古有交往。有學者認為，中國人移居南洋始於秦漢。<sup>①</sup>明中葉以前，中國與南洋的交往多為商業貿易。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等西方各國競相開拓海外殖民地，在南洋地區開始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角逐。要把南洋變為理想的商品輸出地和原料供應地，必須大力開發。此時，南洋土著相對比較落後，視入侵家園的西方殖民者為強盜，抗爭不斷。如此，西方殖民者很快注意到移居這裡的中國人。

與南洋各國相比，旅日中國人人數較少。據學者考證，中日兩國的密切交往可上溯至春秋戰國時期。<sup>②</sup>明亡之際，東渡日本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明萬曆崇禎年間，中土兵亂大作，人民迫

於困軛，多攜僕從數輩前來長崎，以避危難。”<sup>①</sup>19世紀中葉，在堅船利炮威逼之下，日本被迫與西方列強訂立通商條約，開放橫濱、長崎、新瀉、兵庫（現神戶）四個口岸。1871年中日兩國締結《修好條規》，“兩國既經通好，所有沿海各口岸，彼此均應指定處所，准聽商民來往貿易，並另立通商章程，以便兩國商民永遠遵守。”<sup>②</sup>日本開關後大部分貿易集中在橫濱一地，旅日華僑的發展也逐漸由長崎轉向橫濱。據統計，1872年旅居橫濱的華僑人數為963人，1887年增至2,578人<sup>③</sup>，以橫濱、長崎、兵庫（神戶）等通商口岸城市為主，華僑社會漸次形成。

美洲華僑在人數上僅次於南洋，北美的加拿大、中南美的古巴等地都有大量中國人移居。而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發生重大影響的則為旅居美國、加拿大的中國人。華人大規模移居美國始於19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1848年加州發現金礦，許多華人懷抱著黃金夢湧入大洋彼岸。據美國海關統計，1850年來美中國人為450人，1851年達到2,716人，1852年則劇增至20,026人。<sup>④</sup>19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南北戰爭後，國家統一，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1861年開始動工修築橫貫南北的大鐵路，招募了數以萬計的華工參與工程建設。為使招募的中國勞工合法化、大量化，1868年美國與清政府簽訂《蒲安臣條約》，“中美雙方協定，兩國人民有移居自由”，政府應“聽其自由，不得禁阻為是。”<sup>⑤</sup>此後，中國人移居美國又出現一個新高潮。據美國海關統計，1866年進入美國的中國人為2,242人，1867年為4,794人，1868年為11,085人，1869年為14,994人。<sup>⑥</sup>中國人移居美國時間雖短，但由於人數多，很快在當地形成華僑社會。

此外，中國人到達美國後，流轉到鄰國加拿大的也很多，特別是美國開始排華後，移居加拿大的中國人更是日益增多，加拿大也成為華僑的一個聚住地。

近代華僑民族民主意識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注，希望一個獨立、強大的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作為自己的堅強後盾；二是華僑居住地多為資本主義國家或其殖民地、附屬國，華僑一方面遭受居住國政府的種族歧視與民族壓迫，另一方面又切身感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先進與文明；三是華僑旅居海外，目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與強盛，其內心有著“富強”的觀念。因此，近代時期華僑的民族民主意識始終貫穿著追求國家獨立、富強、民主的精神，這也是中國民主革命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和達致的目標。

辛亥革命時期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以華僑贊同和支持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民主革命主張為其標誌的。

首先，我們通過以上概述分析華僑出國的原因，從中管窺其民族民主意識覺醒的潛在因素：

一是因國內政治迫害而逃亡海外。多表現在朝代更替之際。明末清初，明朝義士為反抗滿清入主中原，在沿海一帶進行抵抗，失敗後餘眾多流亡海外；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餘部輾轉閩粵沿海等地抵抗失敗後，餘眾多遁至海外避難。這些人構成海外華僑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政治逃亡者。

二是為生活所迫出洋謀生。這是近代時期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以出洋謀生最多的閩粵兩省而論，人口稠密山多地少，或“七山一水二分田”，或“八山一水一分田”<sup>⑦</sup>，且兩省臨近海洋，百姓易於漂洋過海。鴉片戰爭後，沿海城市多闢為商埠，資本主義商品潮水般湧進，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受到極大衝擊，大批農民、手工業者相繼破產，造成了龐大的失業群體。

三是西方殖民者勾結沿海地區的地痞流氓匪徒，誘騙和綁架人民，拐賣出國，大量“豬仔”華工被販運到南洋各地以及南北美洲，在種植園、礦山等處從事繁重勞動，遭受非人待遇，“惡夷等恃富凌貧，喪良藐理，視合同如故紙，等人命於草芥。衣食工銀惟知吝嗇，憔悴憊倦莫肯恤

憐。常見苛求，恒加打罵，或被枷鎖而力作，或忍饑寒而耕鋤，在東家既屬苛殘，官府依然阿比，縱爾鳴冤，反遭譴責，時時聞屈死之慘，處處有自盡之哀。”<sup>⑧</sup>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中國人移居海外都包含著對當時國內環境和外國侵略者不滿的潛在因素。這種因素在祖國災難日益深重、民族民主革命任務日益緊迫時，就極易激發為他們要求改革祖國現狀乃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的動因。

其次，華僑移居的南洋、美洲、日本三個地區代表了近代世界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地區，它們的歷史與現狀為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培育提供了不同類型而又具有某種內在聯繫的沃土和溫床，促生了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

南洋：西方列強殖民南洋後，資本主義先進的文明、制度也隨之輸入。儘管華僑仍保留著中國的傳統，但畢竟生活在較國內更為開放的環境裡，心理上易於產生直接反應，感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先進性，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觀念也不斷滲入他們的腦海。僑居地的自由競爭政策也迎合了吃苦耐勞勤奮的華僑的要求，促使他們接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科學技術。1899年，福建舉人黃乃裳向殖民地政府申請開發詩巫，使昔日荒無人煙的詩巫變成了繁榮富裕的“新福州”。黃乃裳在簽訂開發詩巫的條約時，提出“吾農友往來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設立公司商業自由、購買槍械自由、航業自由諸權利”，並且還“無納丁稅、無服役、無當兵義務”。<sup>⑨</sup>這些權利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黃乃裳要求享受這些權利，說明他贊同並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

此外，南洋土著的愛國愛鄉熱情也深深感染了華僑，對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產生了催化作用。不少華僑參加了1872～1902年菲律賓人民長達三十年的反抗西班牙和美國殖民者的鬥爭。如福建南安華僑劉亨賻因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鬥爭中表現出眾，被菲律賓總統阿奎那度授予准將銜，後更被菲律賓人民起義軍推選為副總司令兼南路總指揮。<sup>⑩</sup>

日本：19世紀中後期，閉關鎖國的日本在西方列強侵略的驚濤駭浪中，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一條與中國等大多數亞洲國家截然不同的“脫亞入歐”道路，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個資本主義近代化強國，也成為侵略中國的列強之一。目睹這一變化，中國仁人志士驚呼要學習日本變法自強，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渴望實現祖國獨立、民主、富強的民族民主意識日益熾烈。東鄰島國所發生的一切，對中國有著特殊的影響，其中，旅居日本的華僑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北美：18世紀後期，英屬北美殖民地爆發了“人類歷史上一個較早的、最偉大的真正的解放戰爭”<sup>⑪</sup>，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所確立的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國家體制，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提供了經驗，一些殖民地國家也以美國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為取向目標。孫中山曾說：“當吾人首創革命推翻專制及腐敗政府而設立民主之時，吾人實以美國為模範。”<sup>⑫</sup>

中國人大規模移居海外是近代中國融入世界的一部分。安土重遷的中國人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分赴異國他鄉，長期生活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異國的一切不時侵襲、感染、刺激著他們，因此，海外華僑社會一開始就孕育著民族民主意識覺醒的潛在因素。但是，在探討這些民族民主意識潛在因素的存在及其滋長時，我們還要看到，海外華僑社會又保留了中國封建社會一些舊的落後的傳統，如宗族思想、小農意識、地域主義、忠孝觀念等等，成為阻礙華僑民族民主意識覺醒的消極因素。這也就決定了在海外華僑民族民主意識覺醒的過程中，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彼

消此長，貫穿著複雜的鬥爭。

## 二、宣傳民族民主革命綱領

1894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孫中山就提出了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痛陳了“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機，揭露了清政府“粉飾虛張”、“辱國喪師”的腐朽怯懦。<sup>⑤</sup>為了照顧華僑當時的處境，這個章程未明確寫入武裝反清的內容，但在秘密誓詞中卻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口號，民族民權主義雛形出現。<sup>⑥</sup>

1903年，在檀香山華僑革命情緒高漲的基礎上，孫中山重建“中華革命軍”組織，繼在日本東京青山革命軍事學校之後，再次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正式列入誓詞。<sup>⑦</sup>這標誌著孫中山已由民族民權主義進而提出了民生主義，舊三民主義初步形成。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決議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政綱。隨之孫中山在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民報發刊詞》等文章中初步闡釋了三民主義理論。此後，孫中山在華僑中的一切組織宣傳活動都是圍繞三民主義而展開。由於貫穿著獨立、民主、富強內容的三民主義與華僑希望祖國強大的願望相符合，所以孫中山高擎的民主革命旗幟越來越得到華僑志士的響應和信從，而三民主義理論在華僑中的傳播又進一步促進了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

孫中山的宣傳活動是從鼓吹民族主義開始的。<sup>⑧</sup>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朝政府，力求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曾作了這樣的概括：“辛亥之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sup>⑨</sup>然而，“反滿”是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最基本內容，儘管避免列強瓜分、爭取民族獨立是民族主義的另一基本內容，但揆諸孫中山在這一時期革命活動的事實，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意圖固然存在，不過，這一內容既不明確，亦未獲得充分的展示，華僑的民族民主意識覺醒，也應以華僑認識到推翻滿清政權是振興中國的必由之路為標誌。

在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滿漢兩民族的種族矛盾同時存在。針對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深重的民族危機和華僑對中國命運的擔憂，孫中山尖銳地指出了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源和解救的辦法，“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是因為“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吾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也。”<sup>⑩</sup>故“欲避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不可”<sup>⑪</sup>，鮮明地打出了反對滿清政府的旗幟。儘管其初期提出的一些民族主義口號摻雜著不少“種族”偏見成分，但是，在華僑革命意識剛剛萌動時期，利用種族的矛盾，不失為發動華僑的一種有效策略。因為，在海外華僑的頭腦中也有著這樣簡單的邏輯推理：中國之所以被列強侵略、欺侮，是由於中國的貧弱、落後，而造成這種貧弱、落後的原因就是滿族這個異族的統治。在他們的潛意識裡存在著如果漢人掌握中國的政權、中國決不會是這樣的想法，“世未有擁五千年文明歷史，五百兆優秀民族，而國家竟長久衰弱、任人魚肉的道理。”<sup>⑫</sup>孫中山對自己的民族是充滿自信的。

在華僑中著重宣傳反滿的民族主義，這不僅是因為它關係到中國的獨立、存亡，是近代中國的首要問題，而且，在華僑社會中民族主義有其固有的市場，可以長久地保存下來。同時，華僑大多數人文化程度較低，對於民權主義等理論一時不易明瞭，而有獨立救亡意義的民族主義每個人都能強烈地感受到，宣傳的素材都是人所共見、人所共聞的，這樣容易產生共鳴。不過，宣傳

的內容，也因各地區有所不同。在日本主要是注重革命理論的全面闡發，參與者也大多是留學生；在南洋、美洲等地則主要注重民族主義的鼓吹。就是每個地區之內，華僑不僅思想狀態不一，對民族主義的感受也不同，如新舊僑民的差別、華僑資本家階層和華僑工界的不同，等等。

感情是影響民意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為群眾意見的形成，多半不是基於公式化的概念，而是基於情感。滿洲之當排也是基於情感。從大的方面說，民族主義最初只是表現對國家潛在的一種愛，基於這種愛，華僑產生了擔憂祖國前途的憂患意識。與此同時，過去滿洲人征服中原殘酷屠殺漢人的事實，雖然為時已久，但一經再度鼓吹，還是易於慫動人心，特別是現實中滿清政權對漢人的差別待遇的態度與措施亦可被誇大渲染。歷史相傳的種族矛盾和現實中存在的種族不平等，在新的環境刺激下，被壓抑的民族自尊、優越感被重新提起，產生了異族統治下的羞辱意識。因而，孫中山揭櫫的以反滿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有著廣泛而有效的煽動和動員作用。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他在注重宣傳民族主義的同時，對民權、民生主義也有所兼顧，力求為華僑所接受。孫中山認為“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是並行的，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做。興中會綱領中提出的“創立合眾政府”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初始方案。稍後，孫中山在華僑中宣傳民主革命綱領時，一再強調，“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立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sup>③</sup>，常常指出“中國如何衰弱，政治如何腐敗，滿清如何暴虐，外國的政治如何良好，人民生活如何優裕”<sup>④</sup>，使華僑明白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如雙輪之並馳，並非相反相背。在華僑中宣傳這種思想和制度，多為華僑所熟悉，容易使他們傾心於革命思想。孫中山在華僑中活動時“覺其中之聰明而有識者，殆無一不抱有維新之志願，深望母國能革除專制，而創行代議政體也。”<sup>⑤</sup>華僑這種潛在的民主共和思想，通過孫中山的組織宣傳，不僅得到了煥發，而且它反過來又促進了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充實和完善。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後提出的“社會革命”綱領，其基本內容是“資本”和“土地”問題，這也是當時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孫中山以“平均地權”的理論來解決這一課題，以求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達後所帶來的“惡果”。由於理論的艱深，加上民生主義“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sup>⑥</sup>因此，孫中山在華僑中很少直接宣傳民生主義理論。但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提出，是基於對民生的關切，“目睹中國之瘡痍，民生之困楚，揆之胞與仁人義士，豈不同情？”<sup>⑦</sup>他的民生主義的提出是為了使中國人民從貧困中擺脫出來，使國家臻於富強的境界。從這一點講，民生主義也最易為華僑所理解。因為華僑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最大的心願就是使自己的祖國富強起來，以爭得一個做中國人的體面。並且，華僑資產階級很希望有一個能夠投資的良好國內環境。對此孫中山是有所見的。他在籌集革命經費時，常常以革命勝利後准許捐款華僑享受國內投資的優惠條件為諾言。這對華僑也有較大的啟迪與激勵。

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從根本上說是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sup>⑧</sup>，他所要發動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是，他的主張、活動卻得不到國內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因為，儘管十九世紀末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出現，資產階級卻處在初生的異常軟弱的狀態，而且，近代中國的特殊環境決定了資產階級與他們的代表有頗大的距離。相反，這時的海外華僑，多因經商致富，小有資財，他們愛國愛鄉，希冀對自己的故國故鄉有所報答，孫中山的政治主張與華僑熱切祖國富強的願望相一致。所以當孫中山高擎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旗

職，在華僑中展開革命理論的宣傳時，不少華僑就成為孫中山的堅定支持者。

### 三、利用改造華僑組織

孫中山萌發革命思想後，就開始了創建革命組織的工作。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都是在海外建立起來的，首先得到了華僑的支持。孫中山等人不僅在海外廣泛設立分會組織，而且改造和利用華僑本身組織，以為革命所用。

早在興中會成立前，日本橫濱華僑工界就存在一種“忠和堂”俱樂部組織，興中會會員尤列、陳少白等與之接觸，為之計畫興革事宜，將“忠和堂”改為“中和堂”，並使之撤去關羽神像破除迷信，訂閱上海、香港報刊數份，趁機灌輸革命思想。“中和堂”曾成為反對維新派的有力團體之一。<sup>⑧</sup>儘管“中和堂”始終沒有改變其普通俱樂部性質，但革命黨人通過華僑這一自身的組織宣傳革命思想，比在華僑中進行個別宣傳，效果要大得多。

最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對美洲“致公堂”的成功改組。1904年1月，孫中山為了重赴美洲，利於開展對“致公堂”的工作，毅然在檀香山加入洪門組織，被封為“洪棍”之職。<sup>⑨</sup>到美後，通過努力，取得了黃三德等“致公堂”首領的信任和支持。爾後，他鑒於美國“致公堂”林立、團體散漫，建議舉行洪門會員總註冊，並代撰“致公堂”新章程八十條，明文規定，“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sup>⑩</sup>，獲得總堂諸幹事的通過。這一綱領的改變，從形式上表明“致公堂”已由一個華僑社會的自治自衛組織演變為具有革命綱領、性質的組織。由於美洲“致公堂”總堂沒有什麼統籌分堂的權力和威信，加上各地華僑受保皇黨影響至深，所以孫中山在美國各地“奔走數月，舌敝唇焦”，仍“收效甚少”<sup>⑪</sup>。但是，孫中山這次改組，表明了他要利用和改造華僑組織為革命所用的意向，同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別是改組了“致公堂”總堂的機關報《大同日報》，驅除了保皇黨的勢力，革命黨人劉成禺成為該報的主編。此後《大同日報》公開倡言革命。“致公堂”會眾的民族民主意識日漸覺醒。

1911年孫中山再次到美，為了徹底改變“致公堂”的職能，使之真正為革命事業出力，“欲使同盟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以泯除雙方畛域意見”，組成“洪門籌餉局，合力籌餉救國。”<sup>⑫</sup>孫中山同“致公堂”首領黃三德、唐瓊昌等多次磋商，雙方表示合作誠意，發表了聯合佈告，“致公堂”還單獨發布佈告，盛讚同盟會員“熱心祖國”，洪門籌餉局順利成立。武昌起義爆發後，籌餉局積極籌款，供應各省義軍“為數頗巨”。<sup>⑬</sup>洪門籌餉局的成立，表明了“致公堂”通過革命黨人的努力，已改變了其職能，對革命事業產生了積極效用。

### 四、創辦報刊進行輿論宣傳

“報紙之三千毛瑟，比戰陣之金戈鐵馬為強。”<sup>⑭</sup>興中會後期，孫中山認識到了這個輿論工具的重要作用。1899年，孫中山在日本命陳少白赴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成為早期“唯一創始之公言革命報，亦革命過程中一繼往開來之總樞紐也。”<sup>⑮</sup>在那風雨如晦的艱難革命歲月裡，《中國日報》成為革命事業中一個重要的亮點，“號召中外，蔚為大革命之風”，“不數年，國內商埠，海外華僑，聞風興起，同主義之報林立”。<sup>⑯</sup>1902年以後，在日本留學生中間興起了一股創辦報刊的熱潮，隨之海外各地華僑社區也都相繼出現了革命性的報刊。革命派創辦報刊，由於資金短缺、保皇派的排擠、居住國的限制，因而頗費周折。革命報刊有些是通過革命派募集資金創辦，有些是利用當地華僑辦的報刊進行滲透以轉為我用。對於報紙的內容，根據各地區讀者的不

同文化程度，有理論性較強的，有文字淺顯通俗易懂的。報面形式多種多樣，既有長篇大論的政治論說，也有點滴新聞的家鄉消息，各階層人士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些革命的報刊始終闡揚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使推翻滿清政府的思想逐漸為華僑所接受。《香港時事畫報》“以幽默之文措辭，鼓勵民族思想，頗能刺激人心，誘導社會。”<sup>⑧</sup>《檀香山自由新報》先後編印《自由言論》、《人道》、《革命真理》、《揚州血淚》四書行世，在僑眾中宣傳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除了報刊宣傳外，革命書籍在華僑社會中傳播和流行，為華僑從思想上接受民族民主革命主張打下了基礎。影響最大的幾本書有：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以及傳統書籍《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孫中山早期就很重視反滿書籍的宣傳。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來到日本橫濱，就大量印刷了《揚州十日記》以及黃宗羲的《原君》、《原臣》篇等。<sup>⑨</sup>《揚州十日記》歷來被滿清政府列為禁書，該書詳盡地記錄了滿清統治者入關後在揚州城大肆屠殺漢人的實況，在華僑華僑社會中傳播這種書籍，目的就是為了煽動反滿的民族情緒；傳播《原君》、《原臣》則是為了揭露君主專制的罪惡，使華僑聯想到當地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相比之下，增強了民主意識。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是當時最為激動人心、流傳最為廣泛的一本書。鄒容在書中強烈要求“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強國，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並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sup>⑩</sup>這些書籍對華僑思想的啟迪作用確實很大。美國華僑梅喬林說：“得鄒烈士《革命軍》一書，日夜捧誦，革命思想油然而生。”<sup>⑪</sup>孫中山也十分推重此書，認為《革命軍》“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sup>⑫</sup>為此，1904年孫中山遊美時，就托《中西日報》社印刷《革命軍》11,000冊，分贈美國僑眾，以廣宣傳。<sup>⑬</sup>

革命黨人在海外演說也是宣傳革命思想的一個重要手段。演說使聽眾身臨其境，更易鼓動起革命熱情。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都擅長演說。楊度非常佩服孫中山的演說才能，認為孫中山的演說暢談竟日，有如萬山之響、千頃之波，言語誠明，氣度寬大。孫中山周遊世界，演講也不知凡幾，聽眾何止萬千，演講中常常能做到“雅俗共賞，頗富於幽默感。”<sup>⑭</sup>孫中山認為在向群眾宣傳革命理論時，“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sup>⑮</sup>汪精衛也很有演說天才，“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sup>⑯</sup>革命黨人經常在華僑中發表演講，對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建立自己的威望有著重要的作用。傳統中國歷來都存在著崇尚權威、仰慕名人的思想。華僑社會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許多人參加革命是對其領袖的絕對信仰，而對他們的思想體系卻無法深入瞭解。所以，華僑在選擇革命派與維新派時，並非支持其主義與思想，而是對其所敬佩的某一領袖的支持。<sup>⑰</sup>也正因為這樣，在革命派與維新派對壘時，互相攻擊其領袖人物的事不時出現。孫中山的高尚品質也是贏得人們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老師康德黎先生說：“何以聰明的華人竟然聽從他？就是因為他為人光明磊落，愛國真忱，性格誠實，為國效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sup>⑱</sup>

輿論宣傳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報紙、雜誌、書籍、演說是傳播革命思想的有效工具和途徑，對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華僑的民族民主意識覺醒儘管有各種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但孫中山革命派的海外組織宣傳活動無疑把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孫中山革命理論的完善，民族民主革命事業的蓬勃發展與華僑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也有著密切關係。

- ①李長傳：《南洋華僑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頁。
- ②③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日本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5年，第94、102～103頁。
- ④⑤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47、105頁。
- ⑥⑧劉伯驥：《美國華僑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第48頁。
- ⑦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第263頁。
- ⑨溫廣益等編：《印尼華僑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194頁。
- ⑩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一輯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65頁。
- ⑪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黃紱丞先生七十自序》。
- ⑫鄭珊湖《菲律賓名將劉亨賻》，香港：《地平線》，1982年6月。
- ⑬《列寧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13頁。
- 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第1冊，台北：1973年，第876頁。
-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9、30、233、233、226、326、47頁。
- ⑳㉑《孫中山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9、65頁。
- ㉒㉓㉔㉕㉖㉗湯承業：《國父革命宣傳志略》，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第810、417、419、11、79頁。
- ㉘㉙㉚《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1、22、200頁。
- ㉛田梅華等：《泰國華僑人物志》，曼谷：自由文化事業社，1956年，第27頁。
- ㉜㉝“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撰委員會編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台北：正中書局，1975年，第522、499頁。
- ㉞段雲章：《孫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階級基礎初探》，載《孫中山研究論集》（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 ㉟㊱㊲㊳㊴㊵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44～45、55、56、68～71、48頁。
- ㊶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3頁。
- ㊷李綺庵、梅喬林：《開國前美洲華僑革命史略》，近代史資料叢刊《華僑與辛亥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79頁。
- ㊸蔣永敬：《華僑開國革命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第125頁。
- ㊹㊺尚明軒等：《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2、547頁。
- ㊻顏清煌：《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李思涵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第196頁。
- ㊼康德黎：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轉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撰委員會編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第105頁。

**作者簡介：**章揚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陳慶勝，廣東省對外友好協會理事。廣州 510610

[責任編輯 陳志雄]